

潘立勇 主 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

中华文化

与 人文精神



浙江大学华文学研究系列

中华文化

与

人文精神

潘立勇 主 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

特约编辑:俞伯灵

责任编辑:张伟建

中华文化与人文精神

潘立勇 主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排版(文三西路金都花园)

杭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插页 3 字数 270000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8-3432-1/G·3401 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总论 中华人文精神及其特质

论中华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与化育之道…………… 潘立勇(1)

也谈中华人文精神…………… 敏泽(60)

分论一 中华艺术与人文精神

论《九歌》祈求生命创造的原型象征…………… 骆寒超(69)

论戏剧的仪式性及其结构组合…………… 胡志毅(111)

论大禹崇拜…………… 周幼涛(123)

中华文艺理论的人文精神…………… 蒋述卓(137)

朱子与退溪之文学批评…………… [韩国]金周汉(145)

韩愈诗歌的主调风格及其潜在基线

…………… [新加坡]王力坚(153)

新诗潮时空感受系统及其人文气质…………… 黄丽华(167)

从中华传统艺术文化精神看艾青“诗中有画”的追求

…………… 王颖(184)

分论二 中华哲学与人文精神

孔子何以广受世人之崇敬…………… [中国台湾]陈立夫(196)

从儒家仁爱思想谈文学的使命…………… [中国台湾]郑向恒(200)

儒学研究的沉思——《本体与境界》序…………… 陈俊民(206)

儒家文化中的人格观念…………… 张家成(211)

儒“道”的体用观与中华人文精神之模式…………… 关长龙(227)

论南明张煌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文精神

..... [澳大利亚]陈永明(243)

近代东南地区的今文经学..... 李明友(252)

魏源的经世思想及其历史评价..... 连连(270)

老庄的哲学地位..... 袁振保(281)

分论三 中华人文精神与当代中国

知识分子与中国文化的价值重建及人文导向

..... 李泽厚 王德胜(292)

(1) 文化转型与人文精神的重构

(00) 关于近年来人文精神建构问题的评述..... 黄健(317)

附录 “华文文学与中华人文精神国际学术研讨会”辑要

(00) 华文文学的基本走向与作为文化内核的中华人文精神

(11) “华文文学与中华人文精神”国际学术研讨会评述

(13) (327)

(17) 来信来电辑要..... (330)

(19) 欢迎词..... (334)

讨论辑要..... (336)

论文提要..... (346)

编后语..... (362)

总论 中华人文精神及其特质

论中华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与化育之道

潘立勇

引 论

就我的理解,中华人文精神是指古往今来海内外中华民族各种文化现象中所蕴涵的基本的文化精神,它形成于“轴心时代”而绵延于中华民族各个时代,影响了中华民族人文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元典性、主导性、共通性的文化精神。^①

中华人文精神蕴涵着深刻的美育品格,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化育之道;形成于“轴心时代”的命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奠定了这种文化精神品格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指归以人之文化存在为本,以人对世界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观照为中介,通过人对与对象世界的各种关系的恰如其分的把握来化解各种矛盾,从而实现人与对象世界关系的和谐,解决人自身的安身立

命的精神寄托,达到人的理想境界的追求。这种文化精神,在人与自然关系上,顺自然而以人为本;在人与社会关系上,循人伦而以和为本;在人与自我关系上,重体验而以乐为本。“循天道,尚人文”的人文倾向、“致中和,得其分”的中和境界以及“崇礼乐,赞化育”的美育工夫,这三者构成了中华人文精神由内而外、由体而用、由境界而工夫的基本内涵和总体风貌,也成了中华传统精神文化共通的精神和最基本、最突出的特征。

这种人文精神和美育品格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时期和各种理论形态都有深刻的体现。中国哲学的伦理本体的主体意识、天人合一的有情宇宙观、知行合一的实用理性、直观体验的思维方式;中国伦理的非功利的价值尺度、从容中道的人生态度、贵和持中的天人及人际关系、情理相协的复性修养工夫;中国宗教的重适性非禁欲(道家)、重现世轻彼岸(禅宗);中国艺术的经世致用、尽善尽美、内入真有的生活化、伦理化、人格化追求,都体现了深刻的人文精神和美育品格。儒家的重人、道家的重生、佛家的重心,殊途同归地表现着重现世、轻彼岸的人文旨趣;儒家的“孔颜乐处”“曾点之乐”;道家的“虚静逍遥”“魏晋风度”;禅宗的“拈花微笑”“林下风流”;理学家的“万物静观”“浑成气象”,无不崇尚着一种情感化修养途径和艺术化人生境界,这正是一种既非宗教性又非纯粹理性的化育境界。

这种人文精神及其美育品格集中表现于道德和艺术有机融合的化育之道,“莫美于教,莫神于化”,艺术以道德为指归,道德以艺术为中介,并以艺术化的心理体验和生存状态为最高境界,艺术与道德实现了有机的融合,使人借助情感愉悦的中介自觉地进入善的境界。这就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化育体系,它以养心厚俗、和谐天人为基本目的,以礼乐艺教、人生美育为基本途径,以化性起伪、消融勉强为基本工夫,以乐感信仰、情感原则为文

化心理基础,实践着“以美引善”、以乐反诚的文化功能。

与西方传统文化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精神、法制精神和宗教精神相对较弱,这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客观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征服,对社会法度关系的规范和契定以及对彼岸超越世界的追求和探索方面相形见绌,而这也使它在对人生的价值体验,对人生的境界追求,对人与对象世界关系的主动协调方面相形见长。在处理人与对象世界三种基本关系,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这三种关系时,相对而言,西方传统文化注重的是分离和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的是和合和体验;前者即使是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也是把自身当作对象来分离反思,后者即使是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是把自然和社会当作自身的一体来融会贯通。因此,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是一种重感受、重体验、重内在超越的文化精神,是一种“圆而神”的文化精神,而西方传统文化精神则是一种“方以智”的文化精神。

鉴于中国文化基因中的宗教因素的先天不足,鉴于科学和法制不可能完全有效地解决人自身的精神寄托终极关怀问题,鉴于高科技世界给人类带来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失衡的负面影响,蔡元培先生在本世纪初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这个重要命题在中国当代和未来社会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中华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与化育之道仍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社会当代精神文明的重要资源。

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华人文精神的元典和中华文化的元典精神

谈到中华人文精神首先有必要考察它的元典。“元典”一词由冯天瑜先生在《中华元典精神》一书中创制,按他的界说,“元典”是指“那些具有深刻而广阔的原创性意蕴,又在某一文明民

族的历史上发挥精神支柱作用的书籍”，“文化元典因其首创性、涵盖面的广阔性、思考的深邃性而成为该民族垂范永久的指针和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②

1. 中华人文精神的元典：“人”——“止”——“化”

中华人文精神的元典，学术界大抵都追溯到《周易·贲卦·彖传》，“人文”一词即出于此：

刚柔交错，天文也（依王弼注）；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王弼《周易正义》注：

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

孔颖达疏：

《正义》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者，言圣人当观视天文刚柔交错相饰成文以察四时变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

程颐在其所著《伊川易传》中释此云：

止谓处于文明也。质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一不独立，二则为文。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天文，天之理也；人

文，人之道也。

朱熹在他的《周易本义》中则有这样的解释：

内离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故为贲。

刚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

止，谓各得其分。

在古汉语里，“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或花纹，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象征符号和典章制度，又引申为修饰加工、文德教化等。这句话的前半部讲观察天道的文饰情状以知四季变迁规律，后半部则讲观察人类的文饰情状以教化天下。根据《周易》的观念，“刚柔交错”，质文相当，这是自然之理“天之道”，故谓之“天文”；而“文明以止”，即文明有节制，有限度，恰如其分，从容中道，这靠人来把握，这是“人之道”，故谓之“人文”。“人文”既与天造地设的“天文”（自然）相对，又与无教化、缺分寸的“质朴”和“野蛮”反照，还与神秘莫测、威严隔世的“神文”不同。人既可以观察自然之象，察其刚柔质文交错变化的情况以把握自然规律；也可以通过恰当的文明以教化天下。“有文明而各得其分”恰切地点明了“人文”的基本特征，其要义就在于“各得其分”（“止，谓各得其分”）。在这里，“人文”不仅是个名词，即指“各得其分”的人伦关系或人伦序列、规律，也是一个动词，即指人对这种人伦关系或序列、规律的合理把握，也即“各得其分”地“化成”。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语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即人文精神。在中国古代，“文化”这一整词在西汉以后才正式作为专有名词使用，其内涵即为“文治教化”或“以文教化”，而

“人文以化成天下”其实已切入后来“文化”的内涵，并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因此，可以说“人文化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与核心。根据我的理解，在这一元典语汇里，集中包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即人文精神的三层内涵，或者说是由内而外、由体而用、由境界而工夫的三重要素，这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倾向、以“止”为度的中和境界和以“化”为用的美育工夫。“人”——“止”——“化”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人文精神与风貌。

首先是“循天道，尚人文”，以人为本的人文倾向。二程曾这样强调《周易·贲卦·彖传》的这段话：“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这番话是深得《周易》要旨的。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科学精神并未得到充分发育，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精神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礼记·大传》说：“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便指明了“人道中心论”的个中奥妙。尽管《中庸》强调“中华人道法自天道，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然而中华文化更重视的是“人道”。因而，中华哲学最大的成就集中在人生哲学；中华文化的根本智慧，也集中在人生的智慧。

在中华传统“人文”观念中，“文”以“人”为本位而人以“文”为本质，对人的理解不停留在人自身，而着重在由社会人伦关系构成的“文”（如《论语》曰：“人者，仁也”，“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从而它就有别于以人的自然本性为出发点的人本主义。“人文”和“人本”一字之差，透露了中西方在对人的文化思考上的不同的文化背影和文化精神。中华元典的人文精神虽然并不特别注重个体人的价值，但对群体人或社会人却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人与天地并立，是宇宙三才之一。《周易》的《系辞传》将人道与天道、地道并称，^③孔子称“天地之性，人为

贵。”^④老子称人为“域中四大”之一，^⑤《礼记·礼运》则说：“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以后，董仲舒更极言“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⑥直至《水浒传》称“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心”，这都是肯定具有理性的人在广袤无边的宇宙间卓然而立的地位，有了人方有文化的世界，“人文”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思索的中心。

其二是“致中和，得其分”，以“止”为度的中和境界。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明以止”的“止”的含义，朱熹称“止，谓各得其分”，也即恰到好处、恰如其分。朱熹注《易传·乾文言》“大哉乾乎，刚健中正”云：“中者，其行无过不及；正者，其立不偏”。^⑦这也可以作为对“止”的一种注解。《易传》曾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⑧，“止”也就是“各正性命”。这个“止”，在儒家的典籍里往往等同于“中”与“和”，如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孔子所称“允执厥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庸之道，所谓“乐而不淫”的中和尺度，所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规矩中有自由、自由中有规矩的境界，都与这个“止”相关。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的就是这种恰如其分的分寸感，追求的是与万物和谐的中和境界。

中华元典里讲中庸、中和、中行、中正、中德的不可胜数，例如：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⑨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⑩

蒙，亨，以亨行，中也。^⑪

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⑫

咸庶中正。^⑬

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⑭

中正无邪，礼之质也。^⑮

中华元典文化的这种中和境界，要求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应该“各得其分”，恰到好处，如中华元典树立的圣人形象就是“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⑯中作为事物存在的最佳状态，正表现为掌握了恰如其分的分寸感。“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⑰这种分寸感表现于行为，发挥于事业，就能达到美的极至。换句话说，叫做“得道居中，故君子无咎”。^⑱

成中英先生曾经谈到：

孔子很注意“时中”，所谓“时中”即行为要符合具体的情况。做一件事没有绝对可以，也没有绝对不可以，即无可无不可。在具体情况下，综合差异因素，从而作出一个判断来实现一个理想价值，这就是“时中”。孔子对“时中”的看法是与《易经》中整个卦辞的含义相互配合的。用“时中”的观点来说明《易经》中的卦象和卦辞，就是把隐藏在《易经》哲学中的观念，变成一个显明的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这就是孔子开拓出来的原始儒家所做的工作。因而，十翼中的象、象和系辞，都充满了中、中道、时中等思想。依照“时中”的观点看，所有的德性（仁、义、礼、智、信），都是一个二元一体的中道本体。仁者不知不行，仁智之用都必须合乎中道。以次比照，其他德性亦然。“时中”就是人生在具体情况下的理想实现。^⑲

这一论述也可以作为对“文明以止”意义理解的参证。

《大学》中有“止于善”之说，程颢这样解释：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善。……《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缙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交止于信。^④

这里所谓“止”强调的是对人的伦理道德的分寸感的把握，这是儒家的分寸感。

在《礼记·中庸》里，“止”的分寸感发展成为“中和”的概念：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是大本，朱熹注：“天下之理皆由此出”；和是达道，朱熹注：“天下古今之所共由”。^⑤中和便是修道达到的最高境界，一旦进入这个境界，就可以位天地，育万物，与天地同参，天人合一。这里所说的所共由之路，便是每个个体修持心性，做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⑥达到最高的境界则是“诚”。“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⑦

其三是“崇礼乐，赞化育”，以“化”为用的美育工夫。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化”字，“化”者，内外融通，不勉不强，自然流成之谓也。任启运《礼记章句》中称：“盖其为教，优游和顺，使人默化而不知”，朱熹也把这种育人功夫称之为

为“化”，“涵育熏陶，俟其自化”^②，使受教育者如同“静对春风感形化”^③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④靠什么来“化成”？王弼《周易正义》谓：“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孔颖达说得更清楚：“《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这就使中华元典人文精神一开始就带上了浓厚深沉的人生现世色彩和人心化育品格。中华元典人文精神不仅重人道，而且重教化，即重人道的教化。这种教化，又必须借助礼乐诗书等形象化、情感化的形式，所谓诗教、乐教、礼教、艺教，都是艺术与道德的有机融合，其实就是一种美育工夫。由《诗》、《书》、《礼》、《易》、《春秋》等古籍组成的中华元典，各有特色或功能，正如《礼记·经解》所说：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絮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但中华元典又有其总体性特征或精神风貌，所谓“五行异气而皆和，六艺异科而皆道”，^⑤这中华元典之“道”即循天道而化之的人道，也即具有鲜明的人文倾向和现世风格的人文精神及其化育之道，这中华元典之“和”即“各得其分”的分寸感；它着眼于“为人”，着行于“教化”，旨在达到各种关系的和谐。与《吠陀》《佛经》《圣经》等以“宗教圣典”垂世不同，也与《物理学》《形而上学》等以“唯智经典”述理不同，中华元典以“人文经籍”的形态出现；它们不同于希腊元典文化那种出于对自然现象最后根据的渴望而形成的执着的纯粹求知精神，也较少印度元典文化和希伯来元典文化那种出于对彼岸的追求与奉献而形成的执着的宗教情怀和出世意识，而着重体现了人文化育精神。中华元典的

人文精神以人伦秩序和谐为基本指归,以艺术化、情感化的人心化育为基本工夫,其基本使命就是“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②这种以“人文化成”为主旨和特征的文化精神成了在“轴心时代”形成的独树一帜的元典文化精神,并在中华传统社会绵延相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主导性的文化精神。这里不妨再引录一些中国先贤的有关语录: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③

孔子曰:“凤凰不至,河图不出。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者皆止者,是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④

[刘向]: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天下。如此不治者,未之有也。^①

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性情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末生于本,行起于心。是以上君抚世,先其本而后其末,顺其心而理其行。^②

这些都表达着中华人文精神一个共同特征,即重视礼乐教化,重视情感化育。当代新儒家牟宗三称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为“圆善”,“圆善”的达到必须通过“圆教”,“圆教”的特点就是浑然融化,他说:

此“化”字最好,一切圆实皆化境也。不至于化,便不能圆,不能实,不能一切平平,无为无作。故“化”字实圆之所以为圆之最高亦是最后之判准。凡冰解冻释皆化也,是融化之化。不融化,则不免有局限,有情执,皆权教也。^③

由“人”——“止”——“化”构成的中华人文精神内在结构是一脉相承的,“人”是本体,“化”是工夫,而“止”则是这种本体和工夫的基本尺度。达到“止”的境界,天人就能合一,天下就能化成。然而,这种“止”的境界的达到,又离不开“化”的工夫,惟有化育,才能既尽人之性,又尽天地之性,使天地之性与人浑然一体。

2. 中华文化之元典精神: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共通精神